

唐詩風格與剪探

江漢大學圖書館

圖書館

王明居

王明居

71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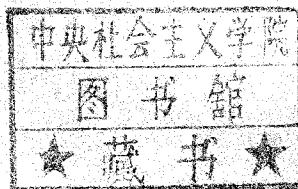
207.22
9

唐诗风格美新探

王明居



200083961



中国文联出版社

唐诗风格美新探

王明居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10,25印张 2插页227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 345册

ISBN7—5059—0024—2/I·12

书号：10355·1024 定价：2.45元

目 录

开创唐诗风格研究的新局面	1
雄丽	
——王勃、骆宾王的诗歌风格美	30
悲慨	
——陈子昂的诗歌风格美	54
雄浑	
——高适、岑参的诗歌风格美	65
冲淡 附：空灵	
——王维、孟浩然的诗歌风格美	79
豪放 附：飘逸	
——李白的诗歌风格美	112
沉郁	
——杜甫的诗歌风格美	134
险怪	
——韩愈、卢仝、马异、刘叉、李贺的诗歌风格美	162
寒瘦	
——孟郊、贾岛的诗歌风格美	184
通俗 附：轻艳	
——白居易、元稹的诗歌风格美	198

清峻	
——刘禹锡的诗歌风格美	211
清峭 附：澄澹	
——柳宗元的诗歌风格美	230
俊爽	
——杜牧的诗歌风格美	247
隐僻	
——李商隐的诗歌风格美	274
绮靡	
——温庭筠的诗歌风格美	300
后记	323

开创唐诗风格研究的 新局 面

(一) 从唐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入手

中国诗史上的黄金时代是唐代。唐诗是中国诗史上不可企及的高峰。鲁迅曾经说过诗到唐已经做完的话，至今仍值得我们咀嚼。的确，唐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在中国诗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在同时期世界诗坛上，也是无与伦比的。从唐高祖李渊受禅于隋（公元618年），至昭宣帝李柷禅位于朱全忠（公元907年），共换了二十个皇帝，历二百八十九年。在漫长的三个世纪中，唐代究竟出现了多少个诗人，他们写了多少诗歌，形成了哪些独特的风格流派？时至今日，已经历了一千多年，难以准确无误地回答。由于当时印刷术还没有发明（宋代毕昇始发明活字版印刷术），诗的保存条件受到很大限制，故流传下来的毕竟是浩如烟海的唐诗中的一部分。不知道有多少精品散失了。拿唐高宗李治（武则天的丈夫）来说，他写的八十六卷集，可惜失传了。唐中宗李显（高宗第七子）写的四十卷集，

也失传了。有名的才女上官婉儿写的二十卷集也失传了。《全唐诗》中保留下来的他们的作品，只是他们作品中的很少的部分。其它亡佚的唐诗，就可想而知了。但从已经保存下来的有限的唐诗来看，也是非常可观的。清代康熙时，彭定求、杨中讷等十人，根据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统签》（计一千三百三十三卷）和清初季振宜的《唐诗》（计七百一十七卷），参照宋、元以来的刻本、钞本，总成九百卷，共搜集诗篇四万八千九百多首，作者二千二百余①。从现存的诗作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唐诗风格的繁荣景象，也可以看到唐诗风格之所以繁荣的原因。以往的许多诗论家，都喜欢从前人的诗论中去探讨唐诗及其风格繁荣的原因，这无疑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直接从唐诗中寻找答案，则不多见。即使引用唐诗，也是首先为了印证自己设计的观点，而不是首先从唐诗中去发掘。这就把唐诗放在从属地位，而不是放在主导地位。我认为唐诗是第一手材料，它是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的形象反映。唐诗风格的繁荣景象和繁荣的原因，首先应该从唐诗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中找寻，因为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唐诗的发展，唐诗风格的繁荣离不开唐代的社会生活。杜甫在《忆昔》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库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显然，盛唐时富足的社会经济生活在这里得到了生动的反映。诗的风格是朴素、平实的。

唐代的社会生活虽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失，但它却艺术

① 这部总集解放后由中华书局加以整理点校，并附录日本毛河世宁纂辑的全唐诗逸三卷，取名为《全唐诗》。

地储存在唐诗及其它艺术作品中，因而我们研究唐诗，实际是寻找当时的社会生活，探索当时的社会生活与唐诗的繁荣这一问题的有机联系，探索唐诗风格发展的轨迹，并从中总结出某种理论规律来，作为我们的借鉴。当然，我们也要结合前人研究唐诗的成果，旁征博引，从多种角度观照唐诗风格美，以开创唐诗风格研究的新局面。

从现存《全唐诗》看来，并非每个作者、每首诗都具有独创的风格。风格是作家成熟的标志，也是作品成熟的标志。有的作者尽管也写了不少诗，但并不成熟，因而就没有获得风格，有的作者，尽管作品不多，但却充分地表现了作者的艺术个性，并以独特的风韵呈现在人们眼前，具有不可征服的迷人的魅力，也就是说它在艺术上成熟了，因而就获得了风格的桂冠。拿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来说，《全唐诗》中保存了她的诗四十六篇，不管是出自她的手笔，还是出自她的御用文人手笔，大都是为朝廷、庙堂歌功颂德的东西。例如：《唐享昊天乐》共有十二章，无非是歌颂太阴、紫极、玄穹、乾仪、天道、太乙、上帝、神武、先化、天扉、乾路、紫微、仙驾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什么“太阴凝至化，真耀蕴轩仪”（第一）呀，什么“乾仪混成冲邃，天道下济高明”（第三）呀，什么“昭昭上帝，穆穆下临”（第六）呀，什么“奠璧郊坛昭大礼，锵金拊石表虔诚”（第八）呀，等等，不外是宗教术语、宫廷套语、宗庙祀辞的堆砌，没有新鲜玩意儿。至于《唐大飨拜洛乐章》，则大要昭和、致和、咸和、九和、拜洛、显和、敬和、齐和、德和、禋和、通和、归和之类祭天地、敬鬼神的把戏，高唱“九玄眷命，三圣基隆”（昭和）、“祗荷坤德，钦若乾灵”（九和）、“百礼崇容，千官肃事”

（禋和）、“皇皇灵眷，穆穆神心”（通和）一类的颂歌，这些，都是类型化的东西，没有作者独创的艺术个性，因而是没有风格的。其它如《曳鼎歌》、《唐明堂乐章》、《唐武氏享先庙乐章》、《早春夜宴》、《赠胡天师》、《制袍字赐狄仁杰》等诗，也是没有艺术个性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武则天所写的诗篇，都是与风格无缘的。当她个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化入诗中时，她也能获得风格的桂冠。且看她的《腊日宣诏幸上苑》：“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此诗系武则天的名作。《全唐诗》说武则天的诗文，皆元万顷、崔融等人所作，此诗也不例外。这种判断不能尽信。我们如果从作品实际出发，去进行分析，就可知，此诗描绘了武则天渴欲赏花的急切心情，是她的刚强性格的形象显现。再看《如意娘》一诗：“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据《全唐诗》第一册卷五第58页转述，此诗实“唐则天皇后所作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她笃爱恋人、思念恋人的悲怆情怀和信誓旦旦、以明心迹的真情实意。可谓缠绵缱绻，愁丝缕缕，但并不哀怨凄切，其情感的流露是适度的、得体的。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现存的武则天的诗，大都是不成功的，只有极少数诗在艺术上才是成熟的。但是，如果我们读到武则天的孙媳妇杨贵妃仅有的一首诗《赠张云谷舞》时，我们不由得被它那独特的风采所吸引。“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此诗用比喻的手法，描绘了舞姿的轻盈美、动态美、柔婉美，含隐蓄秀，韵味无穷。当我们读了其它作品中的什么如娇花照水、弱柳扶风、弱柳随风疑举袂之类的句子时，就会联想起杨

贵妃的诗句来，而感到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在唐诗的海洋中，不见得字字珠玑、首首成功，只有那些显示出艺术独创性的诗篇，才可打上风格的印章。即使武则天手下的著名才女上官婉儿的诗，也不例外。上官婉儿（公元664—710年）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在唐太宗、唐高宗时，曾显赫一时，其诗绮错婉媚，被称为上官体。这对上官婉儿也有很深的影响。她的某些应制诗，辞藻华丽，过于堆砌，没有个人的真情实感，只是一味地歌功颂德，故并非成功之作，如《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翦彩花应制》、《驾幸三会寺应制》就是这样的诗。当然，如果她尽写这样千篇一律的诗，是决不会成为才女的。她也写了一些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诗篇。且看《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中的一些诗：

放旷出烟云，萧条自不群。漱流清意府，隐几避嚣氛。
石画妆苔色，风梭织水文。山室（一作空）何为贵，
唯余兰桂薰。（之十二）

策杖临霞岫，危步下霜蹊。志逐深山静，途随曲涧迷。
渐觉心神逸，俄看云雾低。莫怪人题树，祇为赏幽栖。（之十三）

攀藤招逸客，偃桂协幽情。水中看树影，风里听松声。（之十四）

泉石多仙趣，岩壑写奇形。欲知堪悦耳，唯听水泠泠。（之十六）

岩壑恣登临，莹目复怡心。风篁类长笛，流水当鸣琴。（之十七）

暂游仁智所，萧然松桂情。寄言栖遁客，勿复访蓬

瀛。（之十九）

潺溜晴疑雨，丛篁昼似昏。山中真可玩，暂请报王孙。（之二十）

傍池聊试笔，倚石旋题诗。豫谈山水调，终拟从钟期。（之二十一）

参差碧岫耸莲花，潺漫绿水莹金沙。何须远访三山路，人今已到九仙家。（之二十四）

凭高瞰险足怡心，菌阁桃源不暇寻。余雪依林成玉树，残羹（指雪）点岫即瑶岑。（之二十五）

这些诗，字斟句酌，出语不凡，构思新奇，境界清新，不堆砌词藻，不故意雕琢，无富贵气，有野趣，耐咀嚼，如果要点明它的风格，似可用“清奇”二字来概括。

以上我们以武则天、杨贵妃、上官婉儿的诗为例，意在说明：具有独特风格的唐诗乃是唐诗中的精品。如果我们把唐诗比为唐代的诗海的话，那么，富于风格的唐诗，决不是这诗海中泛起的转瞬即逝的泡沫，而是具有活的生命力的翻腾的波澜，或是随风荡漾的涟漪。上述三人的诗，在唐代诗史上并不是一流的，象杨贵妃那样善歌善舞的女子，在艺术上也只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在诗歌方面并未见到有何巨大的成就，尽管她写了那首别具风格的诗篇，也不过证明她是个业余诗歌爱好者。当然，作为业余爱好者，能写出这样优美的诗也是难能而可贵的。在三人中，上官婉儿的影响要大一些，在文学史上也有她一定的地位，但从唐代诗坛上来看，她的贡献毕竟是有限的。三人的诗，不论孰多孰少，只要是形象地显示出作者的独创的艺术个性和表现了作者的真情实感的，那便获得

了风格。否则，只是追求千篇一律的共性和单调枯燥的表现方式，就不能获得风格。可见，风格是诗人的艺术生命，也是唐诗的艺术生命。浩如烟海的唐诗，培育、薰陶着许许多多唐代诗人，使他们不断得到诗的乳汁的营养，使他们的作品能结成风格的硕果。唐代之所以成为中国诗史上的黄金时代，唐代之所以出现那么多著名的、杰出的、伟大的诗人，唐代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光采夺目的诗歌艺术明珠，其原因固然是复杂的，但却与唐诗的繁荣有关，如果没有那样浩渺无垠的诗歌泽国，恐怕也是不会出现唐诗风格发达盛况的，可以说，繁荣的唐诗海洋为发达的唐诗风格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营养。具有独创风格的唐诗正是唐代诗海中徐徐升起的一片片美丽的岛屿。唐诗风格的繁荣正是唐诗繁荣的根本标志。因而我们在研究唐诗风格繁荣的原因时，就不能离开对于唐诗繁荣的原因的研究，而研究唐诗繁荣的原因，也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掘唐诗的风格美。

(二) 博取众长，转益多师， 切中肯綮，力戒片面

唐诗的繁荣与唐诗风格的繁荣，往往是互为因果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没有一定的数量，就难以保证一定的质量，而具备一定的质量，就可促进一定的数量的发展。可见，唐诗的繁荣的结果是出现了唐诗风格的繁荣，而唐诗风格的繁荣又刺激了各个阶层广大人群去追求唐诗风格美，去深入广泛地创作唐诗，因而形成了波涛汹涌、浩无际涯的唐诗海洋。这就是唐诗的特定的质与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告诉我们，从方法论上

看，唐诗繁荣的原因也很可能是唐诗风格繁荣的原因，因而我们在探讨唐诗风格繁荣的原因时，也不可忽视对于唐诗繁荣的原因的探讨。

不少学者，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对唐诗之所以繁荣的原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一些人在阐述自己的正确观点时，往往看不到别人的正确观点，甚至把别人的正确观点也给否定了。这种做法的结果，不仅不能使自己的正确观点得到发扬光大，反而会在否定别人正确观点的同时削弱了或抵消了自己的正确观点。这是很可惜的。例如：不少人认为，唐诗之所以繁荣，是由于唐代统治阶级采取了以诗取士的开明措施，去网罗人才。不分门第贫富，只要写的诗被王公贵族看中，即可登科及第，而受到起用。这就大大地刺激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写诗热情，因而便促进了唐诗的繁荣，而其它朝代之诗所以不及唐代，就是没有以诗取士的缘故。为了印证这种观点，他们便援引了宋代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的话：“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见《沧浪诗话较释》第1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这种分析，的确道出了唐诗繁荣的部分原因，也是应该肯定的。有的人却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以诗取士不是唐诗繁荣的一个原因。其理由是：第一，唐代以诗取士始于唐玄宗时。《旧唐书》卷一九《杨绾传》云：“天宝十三年，玄宗御勤政楼，试博通坟典、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出众等举人，……取词藻宏丽外，别试诗赋各一首，制举试诗赋，自此始也。”这就是说，以诗取士，开始于天宝十三年；而天宝十三年前，却经历初唐、盛唐，正值诗歌的昌隆发达时期，可见唐诗之繁荣的原因，不能

归之于以诗取士，因为未以诗取士之时，唐诗已经繁荣了。第二，以诗取士的诗，多为应制诗，都是歌颂皇帝功德的，内容平庸，形式呆板，语言堆砌，千篇一律，它不是唐诗繁荣的标志，而独具风格的发达兴旺的唐诗主流，决不是应制诗，而是具有活泼泼的生命力的、显示了诗人艺术个性独创性的诗，而这些诗，才是唐诗繁荣的标志。它决不是以诗取士的考场上绽开的花朵。为了印证这个观点，他们也援引了一些材料。如举王世贞《艺苑卮言》云：“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又举杨慎《升庵诗话》云：“胡子厚与余论诗曰：人有恒言，唐以诗取士，故诗盛，今代（指明代）以经义选举，故诗衰，此论非也。诗之盛衰，系于人之才与学，不因上之所取也。汉以射策取士，而苏李之诗、班马之赋出焉，此系于上乎？屈原之骚，争光日月，楚岂以骚取人耶？况唐人所取五言八韵之律，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今传世者非省题诗也。”这种说法，也有合理之处，它细致地分析了诗的盛衰原因的复杂性，从历史的角度（楚汉）和现实的角度（唐），说明了唐诗繁荣的原因应从人的才与学两方面找寻，这无疑是别有见地的论析，但是却完全否定了“以诗取士”的作用，完全否定了“上之所取”的作用，完全否定了“省题诗”的作用，这就无片面性了。唐诗繁荣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我们固然不能把唐诗繁荣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以诗取士”、“上之所取”和“省题诗”的作用，也不能否认它们的作用，而应该进行恰如其分的切中肯綮的分析。

唐诗的繁荣，有其异常复杂的原因，执着于某一个角度去下判断，是不行的，而必须高屋建瓴，全面考查，从宏观的高

度去鸟瞰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等方面的总体情况，从微观的角度去研究促使唐诗繁荣的具体情况。以宏观研究带动、统领微观研究，以微观研究充实、强化宏观研究，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庶几可免片面性的错误。具体地说，唐代以诗取士，不失为唐诗繁荣的一个原因，但只是一个原因，把它说成是唯一原因，固然显得执着；而完全否定它的具体存在，也不公允。如果我们把许许多多促使唐诗风格繁荣的具体原因（包括以诗取士）进行微观研究，并在这基础上，予以对照、比较、分析、综合、概括，总结出合乎规律性的东西来，也就是从宏观方面立体地把握它，那么，对于唐诗的繁荣和唐诗风格的发展的原因，才会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

(三) 唐诗风格为什么繁荣？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特定的上层建筑总是为特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历代统治阶级，在推翻旧王朝的统治以后，总要千方百计利用特定的上层建筑为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以强化自己的统治。因而他们很重视上层建筑的社会作用。文学是上层建筑之一，唐诗是唐代上层建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维护唐代的经济基础当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在唐代建国之始，就得到唐太宗的高度重视。唐太宗从未把唐诗视为雕虫小技，而是把唐诗当作宣扬国威、张扬国力、美化帝国的重要工具。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充分地证实了这一点。他写的《帝京篇十首》就是这样的诗，其第一首云：

秦川雄帝宅，函谷壮后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薨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城阙，风烟出绮疏。

这里，描绘了唐王宫殿的高大雄伟，富丽堂皇，显示了唐朝开国之初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它起着统括全篇的作用，其余诸首则或写“岩廊罢机务，崇文聊驻辇”的忙中偷闲的心境（第二首）；或绘“雕弓写明月，骏马疑流电。惊雁落虚弦，啼猿悲急箭”的愉快的狩猎生活（第三首）；或写“急管韵朱弦，清（一作长）歌凝白雪。……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的健康的音乐欣赏（第四首）；或写“桥形通汉上，峰势接云危。烟霞交隐映，花鸟自参差”的奇妙风景（第五首）；或表现“萍（一作梁）间日彩乱，荷处香风举。桂楫满中川，弦歌振长屿”的优美情境（第六首）；或抒发“长烟散（一作引）初碧，皎月澄轻素。寒幌玩琴书，开轩引云雾”的闲适情怀（第七首）；或表述“得志重寸阴，忘怀轻尺璧”的崇高志向（第八首）；或铺陈“罗绮昭阳殿，芬芳玳瑁筵。珮移星正动，扇掩月初圆”的繁华场面（第九首）；最后，则写居安思危，国运乃昌，故以“人（一作入）道恶（一作患）高危，虚心戒盈荡。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总结全篇（第十首），以教育他人。关于这诗的社会作用，李世民在该诗的序言中讲得很清楚：是为了“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漫之音。”“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他声称“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在序言中，李世民从历史和

现实这两个方面，说明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目的，是为了发扬正气，扫荡弊端，崇尚和谐，反对淫乱，提倡实际，反对浮华。一言以蔽之，是为了唐代帝国的繁荣昌隆。可见，李世民不仅在创作上重视诗歌的社会作用，而且在理论上也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全唐诗》把《帝京篇十首并序》放在第一篇，足见它的重要地位。从李世民现存的六十九篇诗中，可以看到，举凡平定边陲、实行讨伐、欢庆武功、临朝听政、宴会群臣、出猎冬狩、登楼述怀、春日望海、咏风弄月等等，均以诗明志，以诗述怀，以诗寄情。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身体力行，带头提倡写诗，因而便成为一个很好的传统，而被唐代历朝皇室继承下来。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九子唐高宗李治，唐高宗第七子唐中宗李显，唐高宗第八子唐睿宗李旦，均会写诗。至于唐睿宗第三子唐明皇李隆基，则更是写诗的能手。他是唐代二十个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凡四十三年）的一个皇帝。他的诗反映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现存诗有六十四首。在《行次成皋途经先圣擒建德之所缅思功业感而赋诗》中，歌颂了唐太宗的帝业：“有隋政昏虐，群雄已交争。先圣按剑起，叱咤风云生。饮马河洛竭，作气嵩华惊。”全诗豪迈进取，大气磅礴。在《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诗中，谆谆告诫十一个州的刺史：“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讲义试诵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茕且存老，抚养复绥强。”可见，唐明皇是在告诫部下要争取做个贤能的爱人的好官。这时，正值开元十六年。此外，唐明皇的边塞诗写得也不错。“龙蛇斗阵法，貔虎振军威。诈虏脑涂地，征夫血染衣”。（《旋师报捷》）这是何等气魄！何等雄壮！何等勇猛！在